

新國際格局與亞太秩序

廖光生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格局驟然巨變，帶動了許多國際政治的變化，這些變化意義深遠，值得進一步探討。

這場巨變首先表現了國際權力分配結構的根本性變動。二戰後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兩大政治集團對峙的冷戰局面。自1962年古巴危機之後，國際局勢不斷從對抗走向緩和。1989年底以來，東歐巨變，兩德統一，美蘇首腦在馬爾他宣佈冷戰結束，蘇聯因國內劇烈動盪而迅速衰落，戰後長期主宰世界的兩極權力結構終於不復存在。

然而，兩極對峙格局打破後，世界新格局到底是甚麼樣呢？許多人認為是多極化的局面，可是多極是哪幾極，卻又不能確定。但是，客觀現實卻是冷戰結束後世界無形中已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其特點為：(1)美國站在金字塔的最頂端，它擁有舉世無雙的綜合國力和無可抗衡的軍事力量，在國際事務中充當着「世界警察」的角色；(2)西歐、日本、德國、中國、蘇聯等次級大國居於第二層，它們因本身的政治、經濟或軍事上的國際影響力，也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美國不得不與它們協商；(3)其他中小國家居於最下層，不過這部分為數眾多的國家還可以根據其對國際影響力分為若干層次。以上這個金字塔式的國際新權力結構，今後十至二十年內也難以打破。美國的經濟雖然不景氣，可是其綜合國力仍遙遙領先，次級大國鮮有與之匹敵者。西歐、日本、德國與美國雖有矛盾卻保持合作，不會挑戰美國的地位；蘇聯今日已完全喪失了與美國對抗的能力。現時唯一可能挑戰美國的是中國，看來中國



強調經濟發展，與所有的鄰邦修好，正踐行韜光養晦，也不可能跳出來對抗美國。因此，不管人們願不願意接受，金字塔式的新權力結構已經形成，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難以改變。

持傳統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理論者往往相信一個超級大國高高在上的局面是很令人擔憂的，因為他們認為世界正處在嚴重的失衡狀態下，極容易引起戰爭。然而歷史上英國自十八世紀初到1915年佔絕對軍事優勢(preponderance)，以世界警察角色自居，其間，並沒有世界大戰，這證明如果軍事優勢操在愛好和平的國家手中是有利於世界和平的。另一方面，1918年後的凡爾賽體系，又到1945年後的雅爾達體系造成相對的勢力均衡，反而致使國際社會動盪不堪。經濟心理學家 Kenneth Boulding 主張勢力均衡容易導致估計錯誤而引發戰爭不是沒有道理的。David Singer Jr. 對戰爭的研究也得出勢力愈均衡、戰爭愈頻繁的結論。這說明軍事均衡的結果很容易導致戰爭，而不利於和平。當今世界兩極體系的打破則是靠和平的經濟競爭帶來的，它顯示了人類進入了一個新紀元，國家與國家的關係正在發生根本轉變，軍事競爭被經濟、科技競爭所取代。如果仍然以「均勢」理論看世界，就很難消除冷戰心態，而大大地落伍於時代了。

目前，各國強調經濟發展是冷戰解體過程中顯示出的全球性發展新趨勢。在以發展經濟為主流的國際社會中，軍事競爭的戰略與思維已不能適用，而等價交換，討價還價，互通有無，互惠互利等生意經卻應運而生。在新的國際格局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內部各層級之間，可以實現一定的相互制約關係，從而達到某種平衡，而不會出現持續性的尖銳對抗，或者超級大國橫行無阻的情況。那種認為只有兩極或者多極才利於建立均勢帶來和平，而一極的存在不利於均勢與和平的看法，在今日也許要「修正」一下了。

在國際新格局下，美國充當世界和平的領導者；日本希望以「政治大國」的姿態出現於國際舞台；俄國希望保持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中國希望以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作為國際交往的基礎。第三世界國家在冷戰結束後，已不可能像以往那樣利用美蘇競爭而獲得軍事與經濟援助，地位相對下降，但它們仍可以聯合起來形成影響國際輿論的力量，產生限制超級大國與次級大國壟斷的天秤作用，以免失去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國際新秩序。不同國家所期望建立的國際新秩序具有不同特徵，在各國外交皆以本國利益為本位的今日，這是不足為奇的。可是國際關係的主要內容既已為經濟競爭，這就將使國際新秩序受到經濟原則的規範，而強調合作與國際分工，必須彼此互惠互利和互相妥協。因此國際新秩序會保持相對的穩定。

在國際新格局下，亞太地區的前景如何呢？第一，亞太地區的國際情勢將大大緩和，熱點問題正逐一得到解決：南北韓由對抗轉為對話，印支半島的戰火停息，阿富汗的內戰休兵，中蘇、中越實現關係正常化，日俄關係正常化也前途在望。

第二，在二十一世紀，亞太各國都朝着安定社會與發展經濟的方向邁進，

區內經濟合作的呼聲頗高，幾個區域合作已在進行與醞釀之中，澳紐自由貿易區、南太平洋貿易與經濟合作協定區和東盟三個區域的經濟合作組織已經建立，東亞與東北亞經濟合作也在拉開帷幕，任何亞太國家要發展經濟都必須加入地區經濟合作的潮流。

第三，在亞太經濟合作的浪潮衝擊下，亞太各國均不能不考慮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美國近期政策的發展，尤顯示其重視在亞太的利益。貝克關於「太平洋共同體新結構」的設計，強調美國要參與亞太經濟。

第四，在亞洲地區經濟最為發達的日本，在經濟與科技競爭的時代，其地位自然更為重要。不過日本正在經歷由經濟大國到政治大國的轉變，亞洲各國對此十分敏感，看來日本今後仍須採取低姿態的態度，避免鄰國的反感，否則不利於其在地區經濟合作中發揮作用。

第五，中國大陸在這種強調經濟發展的時代裏，由於資金缺乏、科技落後，目前無法與美日競爭。但中國大陸現正埋首於經濟，實行睦鄰政策和全方位開放政策，今後必須進一步與國際社會溝通，改善形象，才可跟上時代步伐，與亞太國家建立更為密切關係。

總之亞太地區進入了一個「經濟掛帥」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和平、合作的時代。而亞太國家之間存在着嚴重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宗教、民族、經濟發展程度等差異，以及種種歷史糾紛，又不可避免地產生許多難以克服的矛盾，極容易妨礙經濟合作的開展。故亞太各國尤需保持理智和克制，加強溝通和理解，在遇到分歧時應講求互諒互惠，不可一意孤行，始能化難為易，維持合作的局面。

在亞太經濟合作中，港、台、大陸的經濟合作自是中國人所關注的。近年來由於氣氛緩和，三地人民在經濟上已由相互隔絕發展為不可分離的關係。雖然三地存在政治、經濟制度的重大差異，可是也存在着經濟上的互補作用：三地互通有無，揚長避短，是大有裨益於三地人民之福祉的。目前香港與大陸的關係已由香港基本法所確定，但大陸與台灣的關係仍然脆弱，香港與台灣的關係愈來愈密切，台灣透過香港與大陸建立經濟關係，使香港成為海峽兩岸的橋樑與中介地。眼下台灣有七百至八百億外匯，如果用於大陸投資，將對香港與大陸的經濟有相當大的促進作用。今後三地應強調彼此的共同利益，而不是片面強調某一地的利益，才能產生更大的聚合力。港、台在發展本身的政治經濟時，要顧及對大陸政經發展之影響；而北京在發展自身的政治經濟時，也應考慮到對港、台政經的不利影響。三地之間彼此尊重，在政治上低姿態，降低意識形態衝突的危害，才能維持長期的經濟合作。大家都以發展經濟為要務，加強溝通與理解，繼續推進三地之間的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朝着一個中國的目標邁進，為下一代創立更好的生活環境。

廖光生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